

胡斯蒂·埃尔诺 (*Husztí Ernő*)

从西往东, 从东往西

关于伦特奈尔·乔巴《匈牙利国家财政事务从奥匈帝国时代到今天的发展历史》这本书的评论



从亚洲草原迁徙过来的匈牙利部落是在10世纪末才在欧洲中部扎根并建国的。从那时起, 西方意义上的国家和国家经济关系开始逐步形成。经历了近五个世纪的繁荣之后, 匈牙利王国先后受奥斯曼帝国, 哈布斯堡帝国以及到20世纪下半期, 受到苏联强烈的影响, 因此在政治和国家财政上都无法自主决定。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崩溃后, 由未成熟的新自由主义启发的市场经济转型并没有带来理想的经济条件。但近10年积极的国家机器的参与, 创造了一个有希望的, 及良好的系统。这本书的作者经济学家博士伦特奈尔·乔巴, 在历史和国际背景下分析了过去半个世纪的国家财政流程, 详细介绍1968年的新经济机制, 其中的一些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地借鉴和使用。

《经济文献杂志》(JEL) 编码: A10、B14、B20、B25、E42、E50、G01、H26、H60、N01

关键词: 经济政策、财政货币机制、奥匈帝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积极的国家模式、匈牙利、欧盟

胡斯蒂·埃尔诺博士 (Prof. dr. Husztí Ernő DSc), 教授, 名誉教授, 匈牙利科学院博士, 计划经济结束时建立两级银行系统的理论之父之一, 高级银行专业人员 (husztierno@t-online.hu)

从匈牙利建国的开始到“延迟”的资本主义(10-19世纪)

伦特奈尔·乔巴最新一部¹关于国内财政从形成开始，通过其艰难的发展，到今天介绍发展过程的这一书，描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过往经历。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对过去非常详细地介绍依然是一个新鲜的事情物，因为除了历史学家之外，大多数人都不会观察和了解过去，而只会注意现在的发展。这本书的作者详细阐述，虽然匈牙利的货币历史—“较晚”建国和长期处于原始的发展进程原因—“沉睡的状况”能起到教化作用，而且在有些时期（如在玛加什国王时代）与其他欧洲国家相对比也是非常成功的。匈牙利征服喀尔巴阡盆地和建国的社会后果、与邻国的关系、土地的“农耕化”、蒙古军队入侵、长达150年的土耳其统治，以及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时期，匈牙利独立的财政制度基本不存在，或是以临时而形成的，所以，封建主义时期在匈牙利比其他西方国家要更长。

由于持续不断的内战和外战，我们只能从1825年开始计算所谓的“改革时代”时期。当时，贵族的精神领袖，其中塞切尼·伊什特万（Széchenyi István）也试图掌握当时国家的真实经济状况，以他们的建议想找到符合当时的“现代化的”解决方案。由于贫困、资金不足、农奴制，缺乏公共负担分摊和贷款紧缺等给匈牙利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可以改善。由这些证明并探索了国家不可持续的封建制度的条件，其中包括贵族土地继承和转让法律作为发展的最重要的障碍之一。当时塞切尼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对资本家来说钱越赚越少，而地主却为土地活得愈来愈穷？他得出的结论是，由于资本家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投资资本，地主却不能自由地出售其土地。因此，它们不能作为贷款或借款的抵押品。只有把借高利贷的可能性留给了他们，致使他们最终无法承担其负担。这种状况，即使是对最有利的经济发展机会也根本无法得以利用，这对工业和农业的落后及停滞不前起到了关键性的阻碍作用。

“塞切尼即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保守主义者。在19世纪30年代，他的改革思想充斥了当时整个社会的精神的内容，但是...随着越来越强大的自由党，突然冒出了一个大的对手”（Kelemen, 1938:2）。尽管从1840年开始制定了一些重要的法律，包括期票法、股份公司法等，但这些法律并没有起到明显的变化，其经济影响几乎无法察觉。塞切尼不仅是1848至1849年自由战争的发动者，而且还以担任交通和公共工程部部长，也成为了其公众人物。因此他遭受了许多“内部的冲突”，因为他在精神对手所管辖的部门中担任了一个要职：他虽然不属于自由党派，但他仍然接手了参与鲍贾尼伯爵（Batthyány）政府的要职资格。他当时为了决定是否参与和接受部长的任命，以违背自己的精神和原则加入到对手的一方，并和自己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斗争。最后，他还是选择了抛开委屈而接受所提供的机会，并相信自己会有机会在实践中达成自己的想法。

虽然在19世纪40年代，有36个较重要金融机构开始在布达佩斯和外地运作，但实际并没有带来突破，因为在1841年维也纳危机导致了最初的改革进程再次破裂，甚至向保守的趋势加重了。五年多后，新宪法诞生，费迪南德五世国王在

1848年4月11日批准生效。这项宪法废除了贵族等级制度、贵族土地继承和转让法律的约束、贵族特权和海关限制,取而代之的是土地、工业和商业的自由化。

在新宪法诞生的历史环境中,不能忽视巴黎和维也纳革命事件的影响。特别是宣布平等分担公共负担而创造了新的财政状况,由此才有可能制定长期的自主预算。作为财政部长,科舒特·洛约什(Kossuth Lajos)认为,建立了国家银行和独立的财政部,才能实现国家渴望拥有的货币的先决条件。但是日益激进的社会并没有选择经济上的独立,而追求政治上的独立,在武器、军事力量的扩张、自主发行货币上、形成匈牙利财政和金融体系等。

然而,由于历史环境以及奥地利和俄罗斯帝国的军事优势,争取独立的战争失败了。随后,奥匈帝国高估了国家的逐步稳定,以抵消国债而实行了严格的经济和税收制度,并将其扩大到此前没有的领域,而且税率是以系统地和有区别性地提高了。因此,后继国的税收负担比帝国的平均水平要高出4%至8%。此外,为了降低国债,还推出了越来越多的新的和符合当时的税种,其幅度也逐年增加。消费税税率的增长超过了所得税的。在这背后,“帝国意图”正是为了让贵族回到君主制的利益上来。

在经济管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金融机构在1848-1849年革命和独立战争前开始的充满活力的发展无法停止,但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出现了重大变化。中间年份主要以较高(18%至20%)利率为主。“匈牙利,没有任何抵抗可能的机会,一直易受先进的奥地利商业资本主义的影响”(Kelemen, 1938:21)。有趣的是,君主国的工业发展政策更有利于捷克和摩拉维亚地区的发展,因为他们比拒不服从的匈牙利人“更顺从”。因此,君主国领导人认为,国家西部地区更加安全和有保障,更不用说经济关系的性质了。然而君主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即使在1867年奥匈和解之后也没有什么改变。

央行的情况也是如此。奥地利国家银行仍然以冷漠态度、有限的贷款、利率相对不利以及的选择性的负面利率政策为特征。因此,匈牙利落后地区的发展受到高利率的阻碍。尽管因国际形势被陷入“强制被动”(俾斯麦首相在启动帝国思路时并没有把奥匈帝国算在内),但奥匈和解并没有带来平等,而是以从属关系签署了协定。“...这的确是个巨大的任务,要确定两个盟国之间的相互平等权利和义务,目前还是没有解决”(Zergényi, 1890:282)。

以上提到的是,在确定共同财政费用的融资比率方面一直存在着不断的分歧。奥地利方希望确定长期,客观的发展计划,而匈牙利方认为,只能按项目确定计划才可以接受。最后,法律规定的是30%至70%的融资比例,有效期为十年(至1877年12月31日)。之后这个比例和时限都不具有约束力。这样,在1878年,奥地利和匈牙利和解的重要事件发生了,建立了共同的中央银行,即奥匈银行。新的中央银行以两个平等的“总行”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分别开始运作,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包括钞票发行的垄断)。²

1867年和解后的国内发展 - 铁路、多瑙河治理、首都改建、阜姆港建设等 - 给公共财政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因为这些建设主要由信贷提供的资金

来完成。根据韦克勒·山多尔（Wekerle Sándor）的提议，所出现的预算赤字以各种税费和规费的增加、政府债券的到期日改变和利率的降低来弥补（Sándor、Kolossa, 1950）。在没有得到所需要的预算收入的情况下，需要长期限制支出和定期增加收入，以确保国家能够履行不断增加的贷款需求的偿还义务。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无法进行新一轮的贷款。为防止这种情况，用法律手段来管理未来的投资项目和融资该项目需要贷款的规模。为了监管上述事项，于1870年，匈牙利建立了国家审计署，它的任务仅仅是检查各个项目的财务背景。

与欧洲趋势一样，在和解后的几年内，匈牙利吸引了大量资本，部分原因是新金融机构的数量增加，另一部分原因是为铁路建设和上述的其它项目融资。这符合除农业外，工业和基础设施（工业、航运、渠道建设等）根据最先进的技术发展的要求。再说，他们希望优先创建生产新产品能力的工厂。为其提供了税收优惠政策。³

匈牙利，根据时代精神，逐渐与封建生产模式撕裂，“在过去十年内，匈牙利的贸易、农业，和整个工业都取得了进步和发展”（Baross, 1877:264）。对工业而言，优惠政策主要是通过强制“公共供应”对国内公司提供的。尽管如此，工业还是落后于帝国其他成员国家的。纳吉·安德烈（Nagy Endre）认为，“工业在君主制的整个时期均衡发展，而是主要集中在从90年代后半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期。[...]工业本身也与农业在经济结构中的主导作用相结盟”（Nagy, 1977:86）。这样，地主阶层的利益主导了经济生活和国家行政管理。1867年后，与哈布斯堡王朝和解并建立共同中央银行后，随着黄金货币体系的引入，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原则上可以开始。

两次大战期间的经济管理

根据伦特奈尔·乔巴的看法，在“准国家地位”时代（从历史规模上看，这个时代时间相对较短），所期望的变化在财政方面也没有真正实现，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大的输家也变成了我们国家。虽然“双头鹰”（哈布斯堡皇室的象征）落幕了，历史上的大匈牙利也被四分五裂了，而且总理卡罗伊的政府和1919年苏维埃共和国在金融领域上也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战争的破坏占国家财富的85%至90%，国家预算赤字巨大，通货膨胀是被肢解国家的主要负担。

即使在独立宣言之后，卡罗伊政府也从奥匈银行维也纳分行收到了大量款项，甚至在布达佩斯重印了某些钞票（25和200克朗的）。然而，这种200克朗的钞票只有一面有图案，背面部分部分是波浪形的线条，部分是没有空白的。后者被命名为“白钱”，而其他的则称为“蓝钱”。民众认为“蓝钱”更有价值，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蓝钱”将恢复购买力。每个人都想以“蓝钱”卖，以“白钱”买。“白钱”被认为是通货膨胀的产物。因此，在卡洛伊政府期间投放市场的大量白钱进一步刺激了通货膨胀（Huszti, 1959）。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共和国的财务部门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没有在君主国的钞

票上盖章,因此这些钞票大量投放于国家其他地区,因而造成了一场,在全球范围内页较大的恶性的通货膨胀。虽然对建立自治中央银行有若干想法,但因为苏维埃共和国只有统治了133天,并且也缺乏所需要的财政工具,所以在此基础上根本无法实现目标。

尽管时间很短,但他们很快就开始银行国有化和一种新的、自主货币的创造。由于货币的投放政策是由维也纳决定的,苏维埃共和国希望摆脱这种依赖。这就迫切地提出了银行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引入。随着银行的国有化,现金流被引导到了国家渠道,但也提出了建立自治中央银行的必要性,因为奥匈银行维也纳总行中断了与布达佩斯总行的所有联系。因此,“准中央银行”的作用暂时委托给金融机构中心,因为其组织及其团队的专业知识最适合这项任务。后来,当决定发行一种新货币时,这项任务被转嫁到了邮政储蓄银行。

然而,在没有中央银行所需要的管理和经验的情况下,只能着手解决当前的困难。由于缺乏零钱,最初发行的是小面值钞票,其次是硬币。同时,希望逐渐使50、100、1000和10,000面值的克朗撤消,但由于历史原因无法实现。与此同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告终的特里亚农条约下令清算奥匈银行,由此匈牙利皇家钞票局接管了当时的匈牙利中央银行的任务。

世界大战后严重的经济损失、难以建立起独立的稳定货币体系、缺乏匈牙利央行和国内资本积累不足、外交政策孤立、赔偿义务等原因,使国家货币(克朗)的价值(购买力)不能保持稳定。⁴为保护国内市场采取了各种措施(进口禁令、新的海关政策等),但还是没有成效。因此,贝特伦(Bethlen)政府被迫采取断然的巩固措施。在其范围内,修订了海关政策,取消了进口禁令、为进口缺失的原材料提供了便利、建立了独立的央行,并发行了新的货币,名称为“彭戈”。

然而,未能改变农业的明显不平衡,农业人口的72.5%拥有了平均5匈牙利亩(1匈牙利亩约0.575公顷)的耕地,0.66%人口而有100匈牙利亩以上的耕地。这一事实也揭示了匈牙利经济结构的落后。尽管通货膨胀加剧,但贝特伦(Bethlen)政府的制度在农业治理方面并没有改变。他的政府极力防止外国人在匈牙利获得土地,在历史当中许多都如出一辙。

然而,农业面临着许多问题,最终在192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更加突出了。事实证明,贝特伦政府在这一期间没有任何效力。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对我国的农业是最为破坏性的打击。贝特伦政府没有办法向小农户提供援助规避借债过多。银行和工业公司也无法避免随之而来的最终一直持续到1933年底的金融和信贷危机。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我们要尤其提出1933年实行的外汇管理制度,并暂停准货币兑换。这其中的历史意义是,在国际金融中,首次暂停了货币的可兑换。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如此彭戈货币在邻国几乎到处都能被接受,就像可兑换货币一样。

1921年成立的(以上提到的)皇家钞票局只能有限地代替中央银行职能,因此,为了巩固经济,在1924年成立了匈牙利国家银行以便满足时代央行需求。它的功能是保护克朗的稳定性、确保相应的黄金覆盖率、发行钞票和将钞票(根据

需要)转换为黄金。中央银行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开始运作，提供保护国家货币价值的职能，通过货币工具影响货币和信贷的供应，确定政策利率和确保了现金所占的黄金比率（Bácskai, 1999）。由于克朗的汇率与英镑挂钩，国内货币在国际上被认为是稳定的。无论如何，这有利于（相当脆弱的）银行业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关系由金融机构中心对扩大商业银行存款、抵押贷款、担保人等的控制也逐步加强了。该中心每年定期向匈牙利国家银行通报措施成果。

1929-33年的经济危机袭击了我国。当时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一战前的水平，而工业生产总值也以12%超过了战前的水平（Romsics, 1996:75）。这导致进一步的财政限制和金融机构中心职能的扩大，国家干预的加强。时任匈牙利国家银行行长波波维奇·山多尔（Popovics Sándor）也赞成这些措施，因为在国际惯例中国国家具有主导权。

匈牙利国家银行于1925年购买了匈牙利货币印刷股份公司，当年开始在迪欧什久尔（Diósgyőr）造纸厂分别印刷生产5、10、20、50、100和1000面值的彭戈钞票。这些钞票不仅质量很高，而且在国际上与其他货币比较都有非常好的艺术设计。一年后的1926年开始，1、2、10、20和50菲勒（fillér）的金属硬币和1彭戈金币的生产。⁵新的支付工具于1926年底（1927年1月1日正式）使用上市。与此同时，克朗钞票撤出市场，于1931年年中结束。

国内经济的资金继续在必要的程度上被填补，但被在1929年5月爆发的经济危机所中断。在国际上很重要的美国主要银行暂停了以现金兑换黄金的支付，欧洲各国央行几乎立即跟进。欧洲央行也低调地降低了本币的价值，匈牙利也是如此。在1931年的夏天，因为原来的经济增长已经停滞不前了，所以又重新开始了对外汇的严格管理政策。

霍尔蒂（Horthy）时代后半叶的一个相对稳定时期，持续时间较短的巩固时期，从1938年被所谓的“久尔计划”（Győri program）即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和军备计划所打断。预计长达五年的项目10亿彭戈的巨额开支，造成了通货膨胀，而且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虽然军事订单增加了就业，但其通货膨胀的影响强烈扭曲了收入状况。用于军备和相关基础设施投资的数额当然地完全因战争破坏而遭受损失。专家估计，战争损失的程度占国家财产的40%，大约有100万人而战死，3亿美元的赔偿义务。最大的损失是发生在私人家庭、制造业、农业和运输交通行业，而且匈牙利国家银行的黄金和外汇储蓄被拖走到西方。

计划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44年12月底成立的临时国会决定实施重建、土地改革和小型国有化、重建经济生活和公共行政，以及迅速消除通货膨胀。该书作者认为，经济和行政管理的发展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上开始的，然后左翼政党的进步导致了以苏联式的集体财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形成。下令和实施土地分配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这一框架内，共分发了560万匈牙利亩土地。其中近70%是农场仆人和工人接受

的,但他们既没有独立的耕作经验,也没有所需要的相应工具。这也造成了未来集体化相对顺利进行。

取代临时政府的联合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建立稳定的国内货币,其准备工作在1945年底开始。在这个框架内,开始积累工业和农产品库存货物用以准备稍后宣布的企稳时期。⁶这取决于箭十字党派政府夺走的3200万美金价值的黄金和产品库存(主要是消费品)从西方是否能归还。在形成商品交换基础方面,农业1946年的良好产量也做出了贡献。

在筹备稳定的进程中,产生了几项关于货币名称的建议,最终决定使用福林,这在历史上这种名称的货币(在卡罗伊·罗伯特、匈牙利国王洛约什一世、拉科齐·费伦茨和科舒特·洛约什时代)比较成功。硬币的名称仍然是代表连续性的菲勒。⁷纸币和硬币的面值是根据国际上传统的二进制和十进制制度确定的,即2、10、20菲勒和1、2和5福林硬币以及10和100福林纸币。⁸

在企稳之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试图在成功的历史性步骤之后为经济复苏创造机会,然而,这一步骤更多的是出现在“经济曲折”中。全球经济危机(生产过剩、油价飙升等)和内部不稳定造成了“火上浇油”的局面。与经济机会相比,可以被认为有效的稳定是通过工业发展来实现的,其目的是确保经济的计划发展(重建),事实上是为了冷战作准备。金融行业的全部国有化,一级银行体系的建立、农业的集体化、国民经济改为全面的计划经济,由此引发了金融爆炸,这就是1951年12月给政府带来的新的关于价格和工资之间的调整问题,因此平均物价水平上升了40%,工资仅上涨了20%,福林的购买力比稳定时期的价值下降了60%。这导致了人口收入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的迅速和单方面发展而转移。试图以各种“加强市场改革”解决难以为继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但这些改革无法削弱社会的不满,随后在1956年爆发了一场革命。在镇压革命之后,一些新的改革思想出现了,这些改革虽然缓慢但稳步地实现了:⁹

- 中央规划的作用下降,企业自主权不断增强;
- 许多产品的市场价格按需求改变;
- 中央工资监控制度已被公司制度取代。

1970年后的十年可被视为“国际危机的时代”。分别在1973年和1979年,匈牙利没有对世界能源危机和基本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作出充分反应,这给一个“内省”国家带来了严重后果。¹⁰“...有必要限制具有购买力的需求、制定新的汇率政策、加入国际组织,并注意到本币的实际购买力。不幸的是,没有实现足够的出口促动力、及进口限制和保护内部价格水平的能力”(Huszti, 2016:447)。专家和政治家都清楚,当时制度是不可持续的,但对解决方案有多种不同的建议。只有努力建立外部平衡,使计划经济体制“现代化”,建立两级银行体系,才带来了实质性变革。这导致了关于单一或两级银行体系、收入关系演变、市场经济的未来和适应国际危机(调整)的辩论。¹¹

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崩溃,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了外贸导向的匈牙利经济。越来越明显的是,制度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世界经济的趋势,尤其是苏联的削弱

也助长了这些。“匈牙利已成为市场经济，但并不是通过在市场基础上发展和加强几十年的，以寻找市场内部突破点的企业基础上而形成的，而是通过西方资本的推动效应”。¹²

市场经济转型过渡时期

该书作者认为，被定义为“社会市场经济”的新制度中并不能维持国家干预，而应以更谨慎地、更完善地引进“新的（原始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由于长期过渡、缺乏资本、不断的预算问题，在西方运作成功的机制未能在国内“社会市场经济”中占据上风。

加入欧盟才带来了变化，因为需要建立与欧盟兼容的制度体系，增加了国家的经济责任，提供了预算支持，协助了民主机构的形成，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发展。同时，某些市场保护措施的取消也造成了对匈牙利不利的影响。然而，与欧盟和非欧盟国家的外贸平衡而且与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相比，外贸额也显著高。

工业效率的提高显然是得益于私有化和所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这确保了人口按照西方模式消费需求，也使增加就业成为可能。事实上，人口不仅有希望能够购买更现代化的产品，而且也希望收入状况也有所改善。根据专家的意见，对于事先无能为力高度不满的，急于想发展的消费者期待着提高生活水平，提高购买现代产品的可能性。为此需要现代化的产品供应、允许购买耐用品的适当收入。

作者巧妙地提到了私有化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后果：“在国家政府出让了国家的财产，在私有化中包含了一种无能为力的事，也就是说，国家无法继续用中央预算融资老化生产结构的产业。”¹³ 在没有兴趣（和资源）的情况下，“自发私有化本质上只能有效地帮助那些接近于国有资产的人在获得财产的目的”。¹⁴ 政府向有权获得赔偿的人提供了赔偿票，但由于许多权利人年事已高，绝大多数是出于非商业目的出售的，只有近三分之一的持票人能够购得资产、土地和市政出租的公寓。¹⁵

因此，考虑到赔偿票的经验，笔者将获得资产所有权可能性的失败归类如下

- 低创业情绪；
- 缺乏国内资源；
- 税收制度；
- 难以将产品投放市场；
- 不确定的借款机会；
- 形式权益的能力不足。

农业的所有制结构比工业和商业的要复杂一些，但农业产出更明显地可以追踪。虽然国有农场和农业合作社的收入发展良好，但由于石油危机造成的原材料和工业价格还是落后。普遍的成本增加，国家补贴减少等导致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发展不利，创收能力被推迟。

作者提请注意一种特别重要的关系：出于政治原因提供的补偿，导致在可耕地的一半以上产生了许多小于一公顷的微型农场。这些农场在没有运作的融资机会的情况下，在过去的五十年都无法适当的，以现代化的方式耕种土地。合作社资产的“解散方式”是不专业的，没有考虑到合作社社员的意向。由于预期和真正现实中发生的问题，大多数社员，特别是较老的，往往宁愿保留住相对安全的社员资格。相比之下，根据作者的调查结果，该部门的条件变得混乱，几十年来积累的农业合作社资产基本化为乌有。

在农业中实现的制度变革的背景下，土地所有权结构、效率和盈利能力结构也发生了负面变化。我们不得不承认，并且不能指望我们在世界市场上的农业地位可以迅速改善，因此有必要为社会后果做好准备。如果没有欧盟和国家的大量补贴，农业经济将为失调功能，因此被视为一个“社会福利”行业。然而，农业在国民经济作用的下降不仅是欧盟国家的一个特点，而且是全球现象，而且造成大量就业和社会问题。

伦特奈尔·乔巴详细论述了银行体系，特别是央行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地位。建立两级银行体系被认为是整个国内金融体系的历史性一步。除了组织变革外，货币监管的重要性也得到了重视，央行、商业银行、对客户的等级和关系体系也都发生了变化。这一切也改变了预算与中央银行之间事先建立的关系，因为信贷系统不能再承担本应由预算要融资的公司融资需求的比例。无偿债能力日益增多所造成的损失，使贷款融资相当于准预算的援助。这尤其有助于危机行业，因为政府希望避免更严重的社会后果。

由于很多人普遍认为，国内银行系统的融资困难只能由外国所有者解决，所以银行私有化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造成困难的原因（过去和现在都）是，

- 外资金融机构必须符合其所有者的收益期望；
- 国内财政管理层要求以他们的资产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和
- 遵守国内央行的对有清还债务能力需求的控制条件。

虽然我们当时还没有成为欧盟成员国，但我们已经采纳了央行监管规则，尽管这些规则尚未符合我们国内标准和做法。最重要的是，央行被禁止在发行时购买主权债务，以按初级需求对其进行“定价”，因为这样可以了解预算的状况。

匈牙利经济在千禧年之后开始增长，这也对国内银行业产生了影响。然而，财政政策仍然薄弱，因此实际收入没有达到预期的增长，由此，人口的借债能力不合理地增长，但是这个增长是表面上的。然而，这也是后来，在与外币贷款偿还义务方面才显现出来了。

在看似“完美无缺”的情况下，预算的实际上支出多于收入，许多国家债务飞涨，与此同时，规律性地出现了全球银行大规模倒闭，让人们意识到了债务危机的到来。政府为了平衡预算，以及央行为了确保货币稳定而采取了哪些措施——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这个问题对匈牙利来说更及时，因为高赤字原因欧盟在2004年启动了过度赤字程序。然而，由于2007-2008年严重影响匈牙利的危机，财政紧

缩的结果变得难以看到。外汇汇率和国外信贷汇率的提高极为不利，导致内部不适当地使用国外的贷款、预算紧缩、财政信心丧失和外国资本大量撤出等导致随后数年的影响。在国家破产的边缘上，国民承担了很大的负担，其自然后果是产量下降、外贸赤字增加、国家援助减少和国内靠工资生活的人生活状况发展不利。

市场经济中的主动国家模型

无论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如何，危机发生后的十年显然都意识到，必须解决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主要从经济政策方面来着手处理。以三分之二的选举胜利使《基本法》的得以通过，在通过后成功通过了稳定法，然后审计署法，并精简国家资产的管理，以便适当执行预算和审计任务提供更广泛的回旋的余地。因为当时国家很接近如下状况：

- 预算无法运作；
- 社会保障，特别是养恤金系统长期短缺，有崩溃的可能性；
- 公司大规模破产、经济环境不确定、基本公共服务运作不良；
- 地方政府大规模破产、社会冲突和公共服务功能失调；
- 外币贷款的家庭大规模无法偿债，社会安宁和稳定的解体（Bethlendi、Lentner，2018）。

该书提请注意，促进合理修改税收结构的预算措施，这些措施导致资本减少和消费税增加。后者不一定好，因为消费价格的上涨幅度超过预期的，这反过来又迫使工资增长超过预期的。在工作人员严重短缺的行业，这尤其有问题，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容忽视。就外债而言，情况有些不确定，因为这种关系的程度没有明显的变化，即使西方投资者的任何负面行为变化也可能造成巨大的平衡骚乱。

货币政策通过将非常规因素纳入其方案中，有助于解决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零利率或接近零（但仍为正）利率，改变了客户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存款和储蓄之间的传统关系。其后果越来越明显。金融机构错误的决定和行为被大量推回（主要是最重要的货币持有群体之间，即人口，但也包括中小型企业）对金融机构的信任，而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作为错误的范例子之一，是以瑞士法郎借贷款的实践，另一个是人口固有的巨额现金储蓄的风险。就这两种风险专家们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但在贷款或现金流方面都没有达成明确而有效的解决方案。第一个主题给使用不同登记方法的金融机构带来困难，¹⁶而另一个主题却造成金融机构资金短缺，扰乱了公众供求平衡，造成了对通货膨胀的恐慌感。¹⁷

对于发行4到5年的长期到期国债计划，可能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 预计只有很小一部分人会选择这种储蓄形式，因为利率低和不信任；
- 如果不信任短期国债，到底为什么会信任5年的国债呢？特别是如果扣除成本后，还要考虑到累计的价格上涨，收益率不是太高；¹⁸
- 考虑到时间的长短，在金融市场有经验和知识的人还是愿意进入证券市场；
- 而且由于患病、死亡等兑换销售会造成损失。

由于财政政策没有支持紧缩而促进了增长、提高了就业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减少外债和改善了财政状况。因此,可以减轻公共事业费用,增加家庭津贴政策。然而,要提高经济竞争力,仍然需要解决更多的任务,其中最突出的是促进储蓄不断形成和竞争力提高的进一步措施。在这方面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将所需要的适当体制制度待形成,而这项工作有可能延续到2020年之后的几年。

这本书的这一章使用丰富的信息描述2010年后所发生的事件,对研究人员来说,具有高度实用价值。所提供的庞大的知识基于大量的研究工作。通过全球经济和债务危及、财政措施和央行货币政策的转变,带领读者了解如何成功处理危机。据作者称,“可以说,在2010年后的经济观和具体行动中,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问题,如改善人口状况、提高教育和医疗体系的质量,因而改善劳动力的健康和教育状况等,是更加直接出现的问题。”¹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试图陈述事实,而让读者对其进行处理和评估,换句话说,并不要逼迫读者接受他的意见。本章提供很多机会碰撞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做法上的不同观点。因此,读者(很可能都应该是专家)可以决定是否同意所描述的观点,或者是有不同的意见。然而,这并不损害作者应赞赏地努力,他以其研究成果为相关研究人员对此提供非常重要和广泛的帮助。

科学分类的关系

最后一章论述了作者对理论和系统总结以及财政货币制度体系、实践和各个时期的关系。作者不打算在各种经济史时代之间设定一个优先次序,不过奥匈帝国时期的事件成为了他的“宠儿”。这很可能与以下事实有关:根据某些意见,匈牙利的某些“准自治”时期是从此开始的。

据该书作者称,国内金融体系的建立有三个支柱:

- 奥匈帝国时期加速建设的经济管理的历史传统;
- 2007-2008年危机的财政和“非常规”中央银行做法;
- 可以期望国家执行的市场监管(诱导适度收益)。

作者还认为,国家对经济治理的全面干预是有害的,但企业经营者的自主权高度自由也同样不利。前者将经济和技术基础与私营企业完全分开,而后者则已证明的导致经济危机。当然,这并不排除国有企业在市场上的主导作用,因为国有企业传统上已经融入经济结构中。²⁰

然而,我认为,根本的问题在于经济要走向何方,应使用什么社会和经济手段?国家多大程度上的支持经济发展活动的政策体系可以被认为是“道德”的?国家的作用在哪里是有必要的,什么时候超过合理的程度,对经济来说什么时候变得势不可挡?谁来承担相关费用?在多大范围内可以集中权力?作者正确地提出了许多问题,但在经过审查和提出的大量文献中没有明确的答案。我本人同意作者的第一部分的结论,即“集中化不是目标,而是实现整顿的工具”。

鉴于上述，作者必然借助在国际文献和奥匈帝国方面取得的经验来寻求对遵守预算纪律机制、“良好税制”和危机后中央银行政策标准的答案。

对国家及其管理的知识解证实了财政政策执行情况的决定性、意义和持续监测。即使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妥协之后，这一点也变得很重要，因为除了薄弱的工业结构外，农业也承担了发展经济的负担。这一点在192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得到了证实：全球经济危机迫使本已疲软的国内产业几乎“崩溃”，造成前所未有的失业率。不幸的是，后来的历史重演，错误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被迫的农业合作形成，以及后来清算这些农业合作社，给不同意这些措施的社会人群造成了许多麻烦。因此，匈牙利农业由于中小和大型农场形成的结构、所有权不确定、在相当大比例的未耕种地区，可能远远没有“恢复”，没有达到据其优势可预期的目标。

就“良好税制或税收政策”而言，当代作者还经常提出一个问题，即税收在不削弱纳税人的情况下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实行，同时多大程度上符合所需的公共开支水平（Mariska, 1871:16）。与此相反政府态度对确保税基的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仅对政府，而且对个别应税群体之间也造成社会紧张。鉴于这一切，作者明确表示：“税收量体裁衣，以适应现实的承受能力，同时要考虑到规避可能出现的预算赤字”。

现代经济的主要问题包括避税、逃漏税、税收欺诈行为以及国家监管的成败、纳税人在危机中和危机后的行为以及确定最佳税率的方式，维持财政约束的时间有多长等。不仅笔者在寻求答案，而且发达国家的一系列专家也在研究寻找漂白经济的方法。这背后是在成功漂白经济的情况下，可以减轻税负。否则，使人烦恼的隐性经济的后果将获得空间。因此，可以同意作者的结论，即“良好的税收制度主要属于理论类别”。

最后（第7）一章第7.1节和第7.2节由于其集中和密集的内容，主要可以吸引预算“历史”的专家，甚至有助于更深入地概述前几章。作者显然在相关文献的处理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多亏了在这方面我自己也有可以获得的来源。

在两级银行系统必要创造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清楚地看到，中央银行的职能需要根据商业银行不断扩大的活动和与公共财政的关系加以调整。至于这两个领域都需要加强中央银行的作用，以支持宏观稳定进程和建立再分配关系。然而，只有货币和财政政策变得更加接近和更加合作，才能确保这一点。除了危机前的单面“通胀跟踪目标系统”外，央行对整体宏观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的责任也可能出现。作者认为，“货币政策的再分配效应凸显出来了，央行决策的设计和透明度已经变得不可或缺，为此需要制定一个解释框架，使货币政策决策能够有宏观经济层面和社会的背景”。²¹因此，笔者同意以下的理论结论：货币政策只能在短期内影响经济过程，这只是一种全面的反周期性的经济政策才能做到。这种被称为迟滞现象效应“大量提高反周期性经济政策的价值，因为……可以对国内生产总值的长期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²²只有拥有自由的机制和劳动能力来扩大供应，受高需求压力的经济体才会增加，否则需求的增加将被通货膨胀的上涨所“吸食”。

财政政策的两个主要分系统 – 财政和货币政策 – 必须是共生的, 以确保经济的竞争力、金融平衡, 以及成功管理可能发生的危机。在这方面, 央行机制发挥着越来越强大的作用。

伦特奈尔·乔巴整本书的特点是, 作者从两个“时间层面”角度说明所发生的事件: 既在此过程中, 又孤立地提出了其主要因素, 这两个因素又是遵循着逻辑关系和相互作用而得出的结论。

Lentner Csaba: Nyugattól keletre, Kelettől nyugatra. A magyar állampénzügyek fejlődéstörténete a dualizmus korától napjainkig. L'Harmattan Kiadó, Budapest, 2019. 伦特奈尔·乔巴 (Lentner Csaba) 《从西往东, 从东往西。匈牙利国家财政事务从奥匈帝国时代到今天的发展历史》哈麦丹出版社, 布达佩斯, 2019年, 第282页。该书英文版本将在2019年秋天, 而中文和法文版本将在2019年年底出版。

备注

- ¹ 作者是国家积极影响模型的倡导者。认为, 计划经济制度在“市场社会主义”的方向上, 其次按时间顺序,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后来在2007至2008年政府更加严格控制的过程中以及政府财政政策和(独立的)央行合作中有最佳的经济监管的可能。他还认为, 不仅在地理上, 而且在经济治理方面也“中立的”匈牙利都可以成功地适用适应其经济和社会条件的经济政策(即不以“模仿”或“被强迫”性的)。这个政策的特点是发展延迟, 不断地试图赶上。伦特奈尔·乔巴的主要作品: Lentner、2005; 2007; 2013; 2015; 2016a; 2016b; 2018; 2019; Lentner et al., 2019。
- ² 应当指出, 奥匈银行布达佩斯总行只有权印制和发行20克朗的钞票。
- ³ 税收优惠包括家庭和手工业、造船业和运输公司零部件的采购等。
- ⁴ “1914年至1924年期间, 物价上升到八千倍, 而工资只有上调到3千5百倍”(Romsics, 2017:87)。
- ⁵ 1931年至1937年间, 面值结构没有变化。银币和硬币的比例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就钞票而言, 撤回了1927年发行的1000彭戈面值钞票, 并更换了10和50面额的钞票(Bácskai, 1999)。
- ⁶ 匈牙利国家银行于1946年3月份关于布雷顿森林公约编制了内部报告, 其中研究是否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以及为了准备必要的加入申请书并满足条件(Husztí, 2016)。
- ⁷ 当时, 福林的现金兑换标准相当于0.0757克纯黄金, 因此一公斤黄金的价格为13210福林。根据黄金平均价, 1美元是11.74福林福林, 而1块英镑相当于29.35福林。
- ⁸ 由于现金流动的要求, 在1951年之前又发行了20福林和50福林钞票。
- ⁹ 这些思想和过程已经预示着我国将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规划方法中走出来。
- ¹⁰ 在那些没有对危机信号作出反应的国家, 国际文献称“内向型”, 而那些立即开始适应变化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国家则是“外向型”。
- ¹¹ 作者非常详细地描述了所指出的过程。
- ¹² 伦特奈尔·乔巴的定义。
- ¹³ 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如果我想乘车参加交通, 我也不会上完全破败汽车里。
- ¹⁴ 自发私有化是1875年第三十七号, 和1930年第五号法律的基础上重新发现的。见Sárközy, 1993:123。

- ¹⁵ 据笔者称，“私有化的一个主要缺点是赔偿票持有人在距离他们较近的大多数中型食品厂中也没有获得控股的份额，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创造出全面的经济条件以及在随后的运作过程中，它们并不支持能够获得所有权的国内人士的少工厂。”
- ¹⁶ 由于还款的实际和登记期限，客户和金融机构之间经常发生了分歧。
- ¹⁷ 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国家头疼的事。细节查看于Husztí, 2018。
- ¹⁸ 国家财政部门指望在未来年平均通胀率达到3%，这导致实际收益率略高于零。
- ¹⁹ 第6章节最后一段。
- ²⁰ 见奥地利、西德、法国、意大利等国家。
- ²¹ 7.3.2关于恢复机构曾面的思考和央行所发挥作用的提高。见关于新型央行政策的详细说明，沃纳科，2017:496。
- ²² 见MNB, 2016。

参考文献

- Baross Gábor (1877): *Az 1875. évi augusztus 28-ra hirdetett országgyűlés képviselőházának naplója XIV.* Budapest. 巴罗什·卡波尔（1877年）《1875年8月28日议会记录》附件十四，布达佩斯
- Bácskai Tamás (1999): *A Magyar Nemzeti Bank története. Az önálló jegybank 1924–1948.*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 Presscon Kiadó, Budapest. 巴奇卡伊·道马什（1999年）《匈牙利国家银行的历史。自治中央银行1924-1948》匈牙利经济学和法律图书出版社、普雷斯肯出版社，布达佩斯
- Bethlendi, András – Lentner, Csaba (2018): Subnational Fiscal Consolidation: The Hungarian Path from Crisis to Fiscal Sustainability in Light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Sustainability*, Vol. 10, No. 9, <https://doi.org/10.3390/su10092978>. 贝特伦迪·安德拉什、伦特奈尔·乔巴（2018年）《地方政府级财政稳固：根据国际经验论匈牙利从危机到财政可持续性的道路》《可持续发展》10(9)
- Husztí Ernő (1959): Bankrendszer és pénzforgalom a Magyar Tanácsköztársaságban. In: *A Magyar Tanácsköztársaság pénzügyi rendszere.*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Budapest, 175–206. 胡斯蒂·埃尔诺（195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银行系统和现金流动》发表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系统》匈牙利经济学和法律图书出版社，布达佩斯，175-206
- Husztí Ernő (2016): Hetvenéves a magyar forint. *Pénzügyi Szemle*, 61. évf., 4. sz., 447–455. 胡斯蒂·埃尔诺（2016年）《匈牙利福林诞生70周年》匈牙利《金融学评论》杂志 61(4): 447-455
- Husztí Ernő (2018): Tetraéder-hatás. A jegybanki alapkamat, a készpénzállomány, a lakossági betétek, a hitelkihelyezés és a seigniorage közötti összefüggések Magyarországon. *Pénzügyi Szemle*, 63. évf., 4. sz., 441–453. 胡斯蒂·埃尔诺（2018年）《四角龙效应。匈牙利央行政策利率、现金存量、零售存款、贷款安排和铸币税之间的关系》匈牙利《金融学评论》杂志 63(4): 441-453
- Kelemen József (1938): *A magyar hitelügy története.* Sárkány Nyomda, Budapest. 克勒门·约瑟夫（1938年）《匈牙利信贷事务的历史》莎尔卡尼印刷厂，布达佩斯
- Lentner Csaba (2005, 2016a): *Rendszerváltás és pénzügypolitika.* Akadémiai Kiadó, Budapest. 伦特奈尔·乔巴（2005年、2016a）《制度变革和财政政策》匈牙利科学院出版社，布达佩斯
- Lentner Csaba (2007): *Pénzügypolitikai stratégiák a XXI. század elején.* Akadémiai Kiadó, Budapest. 伦特奈尔·乔巴（2007年）《二十一世纪初的财务政策战略》匈牙利科学院出版社，布达佩斯
- Lentner Csaba (2013): *Közpénzügyek és államháztartástan.* Nemzeti Közszerkesztési és Tankönyvkiadó, Budapest. 伦特奈尔·乔巴（2013年）《公共财务和国家财政政策》国家行政和教科书出版社，布达佩斯

- Lentner Csaba (2015): *Bankmenedzsment. Bankszabályozás – pénzügyi fogyasztóvédelem*. Nemzeti Közszolgálati és Tankönyvkiadó, Budapest. 伦特奈尔·乔巴(2015年)《银行管理, 银行监管 – 金融消费者保护》国家行政和教科书出版社, 布达佩斯
- Lentner Csaba (2016b): A gazdasági válság hatása a globális, uniós és hazai szabályozási környezetre In: Auer Ádám – Papp Tekla (szerk.): *A gazdasági világválság hatása egyes jogintézményekre Magyarországon és az Európai Unióban. Interdiszciplináris és jogösszehasonlító elemzés*. Nemzeti Közszolgálati Egyetem, Budapest, 45–84. 伦特奈尔·乔巴(2016)《经济危机对全球、欧盟和匈牙利监管环境的影响》发表于埃耶尔·亚当和保普·泰克拉(编辑)《全球经济危机对匈牙利和欧盟一些法律制度的影响》匈牙利行政大学, 布达佩斯, 45-84
- Lentner Csaba (2018): *Kormányzati és közigazgatási feladatok közgazdasági és közpénzügyi meg-
alapozása*. Nemzeti Közszolgálati Egyetem, Budapest. 伦特奈尔·乔巴(2018年)《政府和行政任务的经济和公共财政基础》国家行政大学, 布达佩斯
- Lentner Csaba (2019): *Önkormányzati pénz- és vagyongazdálkodás*. Dialóg Campus, Budapest. 伦特奈尔·乔巴(2019年)《地方政府的财政和资产管理》迪奥格校区, 布达佩斯
- Mariska Vilmos (1871): *Pénzügytan. Különös tekintettel a nevezetesebb államok államháztartására*. Petrik Géza, Pest. 马里什卡·威莫什(1871年)《金融科学。特别注意到较著名国家的公共财政》佩特里克·盖杂, 佩斯
- MNB (2016): *Növekedési jelentés*. Magyar Nemzeti Bank, Budapest, december. 匈牙利国家银行(2016年)《增长报告》匈牙利国家银行, 布达佩斯, 12月份
- Nagy Endre (1977): Állami beavatkozás a monarchiabeli Magyarországon. *Gazdaság és Jogtudomány*, 11. évf., 1–2. sz., 85–115. 纳吉·恩德勒(1977年)《国家干涉在君主国时期的匈牙利》匈牙利《经济学和法学杂志》11(1-2): 85-115
- Patai, Mihály – Parragh, László – Lentner, Csaba (2019): *Hungary in a Changing World*. Éghajlat Publishing, Budapest. 巴塔伊·米哈伊、巴拉格·拉斯罗、伦特奈尔·乔巴(2019年)《匈牙利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气候出版社, 布达佩斯
- Romsics Ignác (1996): Az államháztartás és a pénzügyi stabilizáció Magyarországon az 1920-as években. In: *Monetarizmus: múlt és jelen (Deviancia vagy normalitás)*. MTA Debreceni Akadémiai Bizottsága – Friedrich Ebert Alapítvány, Debrecen. 罗姆西基·伊格纳茨(1996年)《1920年代匈牙利的一般政府和金融稳定》发表于《货币主义: 过去和现在(异常或正常)》匈牙利科学院德布勒森委员会、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基金会, 德布勒森
- Romsics Ignác (2017): *A Horthy-korszak. Válogatott tanulmányok*. Helikon Kiadó, Budapest. 罗姆西基·伊格纳茨(2017年)《霍尔蒂时代。论文选集》匈牙利黑里肯出版社, 布达佩斯
- Sándor Vilmos – Kolossa Tibor (1950): Magyarország államkölcsoöneinek történetéből, az 1873. évi válság idején. *Századok*, 84. évf., 1–4. sz., 353–378. 山多尔·威穆什、科洛绍·蒂博尔(1950年)《从匈牙利国民贷款的历史, 1873年这一年的危机中》匈牙利《萨扎多克》84(1-4): 353-378
- Sárközy Tamás (1993): *A privatizáció joga Magyarországon 1989–1993*. Akadémiai Kiadó, Budapest. 莎科兹·道马什(1993年)《匈牙利私有化法, 1989-1993年》匈牙利科学院出版社, 布达佩斯
- Vonnák Balázs (2017) (szerk.): *Modern jegybanki gyakorlat*. Magyar Nemzeti Bank, Budapest. 沃纳克·鲍拉日(2017年)(编辑)《现代央行实践》匈牙利国家银行, 布达佩斯
- Zergényi Jenő (1890): A quota kérdéséhez közjogi szempontból. *Jogtudományi Közlöny*, 25. évf., 36. sz., 281–284. 责盖尼·耶也诺(1890年)《从公法角度看配额问题》匈牙利《法学公报》25(36): 281-284